

从丝织品用途看唐代蚕桑政策

刘芳¹, 宋超², 张建琴³, 黄世瑞⁴

(1. 山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淄博 255000; 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科学技术史研究院, 南京 210044;
3. 嘉兴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嘉兴 314001; 4. 华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广州 510006)

摘要: 丝织品是唐代重要的手工制品, 在经贸、政治及社会文化生活等领域发挥重大作用, 加上唐代社会对丝织品的需求量巨大, 丝织品受到统治者高度重视, 作为丝织品基本原料来源的蚕桑生产必然需要加强政策调控。通过分析唐代蚕桑政策的相关史料, 认为皇帝诏敕是倡导重蚕思想的至高权威, 政法措施是贯彻重蚕思想的基本依据, 地方官员是落实政法措施的主要力量, 唐代有利于蚕桑的政策是满足唐代经贸、政治及社会文化生活等领域对丝织品需求的重要保证, 是唐代蚕桑丝绸业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丝织品; 用途; 唐代; 蚕桑; 政策

中图分类号: TS146; K242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1-7003(2018)05-0096-06 引用页码: 051303

Sericulture polic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urpose of silks in Tang dynasty

LIU Fang¹, SONG Chao², ZHANG Jianqin³, HUANG Shirui⁴

(1.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Shan 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255000, China; 2.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China;
3.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Jiaxing University, Jiaxing 314001, China; 4.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Silk fabric was an important handicraft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played a great role in economy, trade, policies and social life. The demand for silk fabrics was very huge in the Tang dynasty. Thus, silk fabrics received great attention of governors. Silkworm and mulberry were the basic materials of silk goods. Therefore, it wa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regulation of silkworm and mulberry produ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many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about sericulture policies in Tang dynasty. It is believed that imperial edicts were the highest authority to encourage sericulture. Political and legal measures were the basic basis to protect sericulture, and local officials were the main power to implement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measures. The policies of developing sericulture in Tang dynasty were the important guarantees to meet the demand for silk fabric in economy, trade, politics,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and so on. The ideas of developing sericulture and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measures were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flourished sericulture in the Tang dynasty.

Key words: silk fabric; purpose; Tang dynasty; silkworm and mulberry; policy

中国作为世界蚕业唯一的起源地, 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取丝的国家^[1], 早在殷代甲骨文中就有

“桑”“蚕”“丝”“帛”等文字^[2]。丝织品作为衣之源, 作为税收之源, 关系民生国计, 作为丝织品源头的蚕桑必然引起历代统治者的重视, 尤其是唐代蚕业政策有利生产发达^[1]。蚕学家尹良莹^[3]先生认为“有唐一代之蚕业, 堪足称为完美。”这与唐代统治者的蚕桑政策紧密相关。综合看来, 学术界对唐代蚕桑政策的研究尚不全面、不系统, 涉及蚕桑政策的内容散见于研究文献, 其中, 蚕业通史研究关注政府对蚕

收稿日期: 2017-09-06; 修回日期: 2018-03-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BZS096);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15DLSJ07)

作者简介: 刘芳(1984—), 女, 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蚕业史的研究。

桑生产的政令,涉及蚕桑政策的如蒋猷龙《中国蚕业史》^[4],周匡明《蚕业史话》^[5],尹良莹《中国蚕业史》^[6],周云庵《陕西古代蚕桑业发展概说》^[7]等论著,研究蚕桑丝绸的断代史学者会将蚕桑发展的原因之一归结为有利的蚕桑政策,如卢华语《唐代蚕桑丝绸研究》^[8]76-81,董明《试述唐宋时期皖江地区纺织业的发展与繁荣》^[9],姜颖《山东丝绸史》^[10]110-112等论著。目前学术界对唐代蚕桑相关研究,尚未有蚕桑政策的专门著述。唐代是丝绸史上的高潮期,丝织品在唐代经济与贸易、政治及社会文化生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在考据唐代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试从丝织品用途这一角度对唐代蚕桑政策进行探索,以管窥蚕桑政策概貌。

1 唐代丝织品的用途

经济贸易方面,一方面丝织品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唐代前期主要的赋役方法是租庸调,所谓庸是指可以通过缴纳绢布代替力役,其时绫、绢、絁是主要税源,《旧唐书(食货上)》载“赋役之法: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11]2088唐后期改行两税法后,绫绢仍是交纳的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需要交纳的绫绢更多。《全唐文》载“定税之数,皆计缙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往者纳绢一匹当钱三千二百文,今者纳绢一匹当钱一千五六百文。往输其一者,今过于二矣!”^[12]4750另一方面丝织品在唐代可以充当货币,发挥流通手段等货币职能。唐代皇帝敕令规定钱帛兼行^[13-14],其年十月六日敕“自今已后。所有庄宅,以马交易,并先用绢、布、绫、罗、丝、绵等,其余市价至一千以上,亦令钱物兼用,违者科罪。”^[15]1627陈寅恪^[16]260先生就曾指出“唐代实际交易,往往用丝织品。”唐代不仅在国内实际交易中将丝织品作为货币使用,在东西方交易中也强力推行使用丝织品。吐鲁番文书中的许多和余账目表明,在丝绸之路上唐政府以和余方式将大量丝织品摊派给民户。丝织品在东西方贸易中除了作为商品交易外,还会充当国际货币职能,赵丰^[17]204先生就认为“从当时西域的情况来看,流通着三种通货:一是银币……一是铜币……另一就是丝织品。三种通货都符合马克思所说的支付手段、购买手段、社会财富材料三个职能而足以充当国际货币。”唐代在丝绸之路上流通着大量作

为货币的丝织品。

政治方面,丝织品可以作为军资、官员俸禄、恩赐赏品等。丝织品作为军资,《通典·食货六·赋税》载“自开元中及于天宝,开拓边境,多立功勋,每岁军用品增。其费余米粟则三百六十万匹段,给衣则五百三十万,别支则二百一十万,饷军食则百九十万石。大凡一千二百九十万(原文“一千二百六十万”,有误)。”^[18]111自开元中及于天宝,绢布作为军费支出合计1100万匹段,唐制:凡赐物十段,则约率而给之:绢三匹,布三端,绵四屯^[19]82。折算起来,1100万匹段合绢330万匹、布330万端、绵440万屯,绢绵合计770万匹屯,占全部军费1290万匹、端、屯,石的59.69%。丝织品作为官俸,唐代惯例,百官俸禄可以实物折充,因此,支付官员的俸禄往往会钱帛兼半:睿宗时“官员日增……太府之布帛以殫,太仓之米粟难给”^[11]3062。穆宗诏令“宜令户部应给百官俸料,其中一半合给段匹者,回给官中所采粟。”^[15]1667太和七年一月户部侍郎庾敬休建议“应文物九品以上,每月料钱,一半合给段匹丝绵等。”^[15]1667被采纳,诏令实行。丝织品充作赏赐品,唐代赏赐物品主要指绢绵布,据不完全统计,仅《旧唐书·本纪》所记赐品中,明确提到或涉及绢帛者,凡74次,每次赏赐绢帛数从2匹至数十万匹段不等;对一般官吏个人的赏赐,一次也是数十、数百匹绢帛不等^[8]161。

社会文化生活方面,唐代服饰虽有等级之分,但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流外庶人各等级皆可服丝织品:“三品已上,大科绸绫及罗,其色紫,饰用玉。五品已上,小科绸绫及罗,其色朱,饰用金。六品已上,服丝布,杂小绫,交梭,双紉,其色黄……流外及庶人服绸、絁、布。”^[11]1952丝绸除充当衣料,用于制作扇子、屏风、帐、被等外,还作为馈赠品及文化艺术的载体。

2 丝织品用途与蚕桑政策的关系

蚕业内部丝织品、蚕、桑是一条互为条件和相互制约的供需链,这三者都直接或间接受到蚕桑政策调节作用及政治文化影响。丝织品用途广度受限于丝织品产量与质量,而丝织品的产量与质量则受限于蚕桑的产量与质量。因而丝织品的用途广度与丝织品的产量与质量都受限于蚕桑的产量与质量,受到蚕桑政策调节作用和影响。当时丝织品尤其是高贵丝织品在经贸、政治、社会文化生活方面发挥的巨

大作用,一直受到统治者高度重视,作为丝织品基本原料来源的蚕桑生产必然需要加强政策调控。

为获取更多更好的丝织品,唐政府出台相关的蚕桑奖励政策。《蚕桑萃编》^{[20]6b}记载了唐代开元年间侍妾与宫女因养蚕获丝甚多获得赏赐的故事。《旧唐书逸文》^{[21]19b}载,唐大历年间韩景辉因为养冬蚕成茧这一创举,获得了终身免除徭役的嘉奖。《太平御览》记载“天宝年间,益州献三熟蚕,紧厚白净,与常蚕不殊。”^{[22]3675}这一养蚕成就可能也与唐代奖励蚕桑的政策有关。

唐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保证丝织品基本原料的来源,为保证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唐政府将蚕茧产量与各级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挂钩。《旧唐书·尹思贞传》中记载了这样的一则故事:神龙初,尹思贞……出为青州刺史,任上有政绩,使其所辖青州境内有蚕一年四熟,黜陟使、卫州司马路敬潜八月至青州,看着青州蚕茧感叹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于此乎!”特表荐之……奏课连最^{[11]3110}。此则故事一方面说明各级地方官员是发展蚕桑的主要力量,其对蚕桑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蚕桑产量;另一方面说明蚕桑产量是考核官员政绩的一个要素,关乎地方官员的升迁,侧面反映了国家对蚕桑的重视程度。

因此,丝织品在现实生活中用途广度与巨大需求量,影响唐代统治者对蚕桑生产的重视程度和政策调控情况。

3 唐代蚕桑政策

唐初高祖即提出了“辄有劳役,义行简静,使务农桑”这一指导蚕桑生产的思想,这一思想后来成为唐代最高统治者重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体现在倡导重蚕思想的皇帝诏敕中。为了使重蚕思想与皇帝诏敕得到贯彻落实,唐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蚕桑的政法措施,作为朝廷政策措施的执行人,唐代各级地方官员积极促进蚕桑发展,使得唐代蚕业堪称完美。

3.1 皇帝诏敕:倡导重蚕思想的至高权威

唐初,唐高祖颁布两道诏书《罢差科徭役诏》与《申禁差科诏》强调:使徭役有节,役民有制,使务农桑^{[12]33}。其中《申禁差科诏》重申《罢差科徭役诏》的内容,明令如不遵诏令执行,重加推罚。唐太宗以隋炀帝扰民废业为鉴,强调少兴土木,勿扰蚕事,他认为“多营池观,远求异宝,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蚕织,

田荒业废,兆庶凋残……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12]128}后世承接李世民的这一思想,为保证民得耕耘,女得蚕织,唐代皇帝颁布了许多与敦劝蚕业,勤课种桑有关的敕令。

唐代皇帝有关蚕桑的诏敕中较为典型的是常袞代唐代宗起草的《劝天下种桑枣制》^{[23]577},其中规定:“天下百姓,宜劝课种桑枣,仍每丁每年种桑三十树。”带有强制性的成分,主要目的是保证蚕食的来源,从而保证丝织品原料的供应。为保证诏令的顺利执行,《劝天下种桑枣制》规定官员“躬亲勉率,不得扰人,务令及时,各使知劝。”

唐代皇帝倡导重蚕思想最具代表性的诏书当属唐宪宗时期颁布的《劝种桑诏》^{[12]645},诏书开篇即强调“农桑切务,衣食所资。”切务:急务,当务之急的意思。与《劝天下种桑枣制》对种桑的规定稍有不同,《劝种桑诏》强调“诸道州府有田户无桑处,每检一亩,令种桑两根,勒县令专勾当。”造成不同的原因当归结于均田制的破坏与两税法的实行。与《劝天下种桑枣制》相较,《劝种桑诏》对官员劝种桑的要求更加严苛,不仅勒县令专勾当,将百姓种桑情况列入官员的年终政绩考核,兼令两税使同访察。与《劝天下种桑枣制》最大的不同在于,《劝种桑诏》明令禁止采伐桑树,如桑树被采伐,“委长吏重加责科”。保证桑树顺利生长的同时,保证了桑叶供应,从而保证丝织品的顺利生产。

与《劝种桑诏》明令禁止采伐桑树相比,唐武宗在《加尊号赦文》^{[12]814}中强调砍伐桑树用于买卖所带来的后果,以达到保护桑树的目的。为满足“给事郊庙之服,奉茧称丝之税”对丝织品的需要,赦文认为应该设置法律条文保证蚕桑的生长,如果不遵从,恣意买卖,就会视为违敕罪。

以上《劝天下种桑枣制》《劝种桑诏》与《加尊号赦文》均强调政府官员在劝课蚕桑中要积极作为,唐睿宗在《申劝礼俗敕》中认为劝课农桑乃是州县长官职责中的重中之重“劝课农桑,牧宰之政,莫过于此。”^{[23]570}牧宰所指乃州县长官,其中牧指州官,宰指县官。唐睿宗此道敕令强调州官的首要政务是劝课农桑。

3.2 政法措施:贯彻重蚕思想的基本依据

为保证“重蚕”思想得到贯彻,唐代采取了诸多劝励蚕桑的政策措施,其中较为典型的措施是采取一切以蚕务为重,将蚕桑放在其他事务之上,这一政

策措施是由蚕桑的生产规律决定的。南宋赵孟坚《采桑曲》载“桑椹紫来蚕务急”生动描述了蚕务一刻不能误的情景,唐代统治者以诏令的形式规定农桑时节政府官员需以农桑为重,多方配合农桑,保证农桑生产按时有序的进行。唐玄宗《禁妨农诏》^{[12]336}中明确强调将农桑放在其他事务之上,命令停止影响农桑的力役及不急之务,若农桑时节百姓有不稳便事须处置,则动用朝集使,由中书门下与所司商议后向帝王报告。

如遇天灾人祸,为保证养蚕活动的顺利进行,唐政府会采取开彼仓储,时令贷给,蠲减徭赋等措施。自唐高祖始采取轻徭薄赋的蚕桑政策,根据百姓的受灾程度采取不同程度的减免措施,唐代初年规定:“凡水、旱、虫、霜为灾害,则有分数: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若已役、已输者,听免其来年。”^{[18]77}高祖之后的皇帝延续了高祖轻徭薄赋的蚕桑政策,且在高祖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其中尤以玄宗为甚:正值养蚕月份,河南北旧谷向没,新谷未登,唐玄宗下《赈恤河南北诏》^{[12]313}要求开彼仓储,时令贷给。徐泗之间丝蚕不熟,在庸课已纳的情况下,唐玄宗下《给复徐泗等州诏》^{[12]349},要求放免地税。河东河北,官人职田,既纳地租,仍征收桑课,唐玄宗认为田树兼税,百姓将不堪重负,遂颁布《禁地租外征桑课敕》^{[12]394}命令禁止地租更征私课。《遣祠南郊华岳温汤敕》^{[12]377}载,唐玄宗笃信道教,遇水旱灾害,忧心农桑之时,会祈祷上苍惠及百姓。唐代其他帝王也有采取诸多劝课蚕桑的举措,如唐宣宗针对夏州等四道土无丝蚕的实际情况,颁布《给夏州等四道节度以下官俸敕》^{[12]843},做出地绝征赋的决策。

为提高各级地方官员劝课蚕桑的积极性,唐代颁布了许多与蚕桑相关的奖惩措施,如唐睿宗颁布的《诚励风俗敕》^{[23]570}强调“又属当首夏,务在田蚕”,首夏即始夏,初夏,是指农历四月,正值养蚕时节。唐睿宗在这道敕令中强调,若能勿扰田蚕,使百姓安居乐业,家有余粮,会得到提升,若政绩尤为突出,将得到更高的提拔;相反,若为政苛滥,户口流移,盗贼四起而不能自治,轻者年终贬考,重者非时解替。

除政策措施外,对于种桑数量及各级地方官员按时课农桑予以律法规定,也是唐蚕桑政策措施的一大特色。中国著名蚕学家尹良莹在其《中国蚕业史》第五节“历代蚕业劝励”中指出“唐代对于桑树,

尤加保护。”^[3]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前文所述皇帝诏令中,在具有强制性的唐律中也有体现,《唐律疏议·户婚》强调“依《田令》:户内永业田,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土地不宜者,任依乡法。”唐律规定“里正按时授人田,课农桑,诸里正,依令:授人田,课农桑。若应受而不授,应还而不收,应课而不课,如此事类违法者,失一事,笞四十。若于一人失数事及一事失之于数人,皆累为坐。”^{[26]249}用刑法保证授人田,课农桑按时进行。对于累计违法者,从里正,到县令,再到州官,均有相应的惩罚规定。种桑通过法律明文予以约束,使桑树按时种植,并得到有效保护,保证蚕有食源,民有衣穿,国有税源。

3.3 地方官员:落实政法措施的主要力量

唐代各级官员是落实“重蚕”思想的主力,是朝廷政策措施的执行人,其对蚕桑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帝王“重蚕”思想发挥的效能。唐代最高统治者制定的蚕桑政策要真正得到落实,必须得到各级官员的鼎力支持。因此,唐代蚕业的繁荣兴旺与各级地方官的积极作为密切相关。唐代许多地方官员任职期间重视蚕桑生产,积极作为,劝课农桑的故事,流传颇广,在唐代蚕业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裴淮是绛州闻喜人,有惠政,甚为当时所称,人吏刊石颂之。太极元年,受自高祖以来所实施的道教政策及道教信仰的影响,唐睿宗为金仙、玉真两公主造观及寺等,时属春旱,兴役不止,影响蚕时,裴淮认为,春旱时节,朝廷大兴土木,兴役不止,使民不得务农桑,影响农桑收成,导致灾情严重,户口流散,进而危及社会稳定,上疏要求停造观寺^{[11]3128-3129}。

要使蚕桑丰收,除不误蚕时,还须勿扰蚕务,否则会造成蚕桑亏损。刘思立,唐高宗时曾任职侍御史,员外郎,宋州宁陵人,于时河南、北大旱,敕遣御史中丞崔谧,给事中刘景先分道赈贍,刘思立在《谏农时出使表》^{[12]1565}中详细指出敕遣御史中丞崔谧等分道赈贍会致使劳民伤财,强调蚕功未毕之时,诏令官员分道巡视赈贍,会延误农桑之务,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谏言秋后闲时进行。

唐朝宰相来济通过齐桓公的故事讲解驭下之术时,谏言唐高宗春不夺农时,夏不夺蚕工,以此达到勿扰蚕时,勿扰蚕务的目的:帝尝从容问驭下所宜,济曰“昔齐桓公出游,见老人,命之食,曰‘请遗天下食。’遗之衣,曰‘请遗天下衣。’公曰‘吾府库有限,安得而给?’老人曰‘春不夺农时,即有食;夏不

夺蚕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取下之宜也。”^{[24]4032}

《唐庐州刺史本州岛团练使罗珣德政碑》^{[12]4884-4885}中记载了庐州刺史本州岛团练使罗珣在庐江劝之艺桑的故事,罗珣的德政,使庐江从“田稀翳桑”变成“艺桑亩亩”。碑文显示,罗珣对庐江实行的是综合治理,涉及不好学而酷信淫祀,豪家广占田而不耕,人稀而病于吏众,艺桑鲜而布帛疏滥等弊政,针对艺桑鲜、布帛疏的弊政,罗珣劝之艺桑,以行赏罚,最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数年之后,环庐映陌,如云翳日。

颜真卿在《梁吴兴太守柳惲西亭记》^{[12]3429}一文记载了县令李清请修湖州乌程县南水亭的故事,修西亭过程中种桑畜蚕,盈于数万,可谓李清发展蚕桑的政绩。《唐故江西观察使武阳公韦公遗爱碑》^{[12]7822}中记载了韦丹在任江西观察使期间凿陂灌田,益劝桑苎的故事。《魏府狄梁公祠堂碑》中记载狄仁杰:缓赋宽役,勉农劝桑^{[12]6302}。大顺时人王保和在《唐抚州罗城记》一文中称“临川古为奥壤,号曰名区。翳野农桑,俯津阡阡。”^{[12]8626}太常奉礼郎刁尚能在《唐南康太守汝南公新创抚州南城县罗城记》中描述抚州属县南城“人繁土沃,桑耕有秋”^{[12]8623}。宝历、大和年间,章孝标《送张使君赴饶州(一作送饶州张蒙使君赴任)》诗云“饶阳因富得州名,不独农桑别有营。”^{[25]5752}袁州经韩愈等人的努力,呈现出“有村皆纺绩”的景象。

4 结 语

丝织品用途广泛,涉及经贸、政治及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对唐代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作为丝织品源头的蚕桑生产必然引起唐代统治者重视,唐代统治者实施一系列促进蚕桑生产的政策措施。皇帝通过发布诏敕颁布政法措施体现贯彻其重蚕思想,依据蚕桑政法措施,地方官员积极有为保护和促进蚕桑生产,对蚕桑发展起到巨大作用。因此,正是唐代有力实施蚕桑政策,使蚕桑生产发达质量堪称完美,从而保证丝织品满足经贸、政治外交、社会文化生活等各方面需要。

参考文献:

[1]刘芳. 唐代蚕业研究[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3, 35(5): 49-55.

- LIU Fang. Study on sericul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J]. 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2013, 35(5): 49-55.
- [2]刘芳,宋超. 唐代已有“蚕蚁”一词[J].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15, 36(3): 364-365.
- LIU Fang, SONG Chao. The Tang dynasty already had the word “newly-hatched silkworm” [J]. The Chinese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5, 36(3): 364-365.
- [3]尹良莹. 中国蚕业史[J]. 中央大学农学院旬刊, 1930(63): 10-14.
- YIN Liangying. History of sericulture in China [J]. Journal of College of Agriculture of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1930(63): 10-14.
- [4]蒋猷龙. 中国蚕业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 JIANG Youlong. History of Sericulture in China [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 Press, 2010.
- [5]周匡明. 蚕业史话[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
- ZHOU Kuangming. Sericulture History [M]. Shanghai: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1989.
- [6]尹良莹. 中国蚕业史[M]. 桃园: 中央大学蚕桑学会, 1931.
- YIN Liangying. History of Sericulture in China [M]. Taoyuan: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Sericulture Institute, 1931.
- [7]周云庵. 陕西古代蚕桑业发展概说[J]. 中国农史, 1989(3): 67-72.
- ZHOU Yun'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sericulture in Shaanxi province [J]. Agricultural History in China, 1989(3): 67-72.
- [8]卢华语. 唐代蚕桑丝绸研究[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 LU Huayu. On Silkworm Mulberry and Silk in Tang Dynasty [M]. Beijing: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5.
- [9]董明. 试述唐宋时期皖江地区纺织业的发展与繁荣[J]. 中国农史, 2014(2): 54-64.
- DONG Ming. Study on development of Wanjiang weaving industry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J]. Agri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 2014(2): 54-64.
- [10]姜颖. 山东丝绸史[M]. 济南: 齐鲁书社, 2013.
- JIANG Ying. The History of Silk in Shandong [M]. Ji'nan: Qilu Press, 2013.
- [11]刘昉.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LIU Xu. Jiu Tang Shu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5.
- [12]董浩. 全唐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DONG Hao. Quan Tang Wen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 [13]李埏. 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J]. 历史研究, 1964(1): 169-190.
LI Yan. On popularity of money and silk in the Tang dynasty [J]. Historical Research ,1964(1): 169-190.
- [14]史卫. 从货币职能看唐代“钱帛兼行”[J]. 唐都学刊, 2006 22(3): 1-5.
SHI Wei. Money and silk in the Tang dynasty in terms of currency function [J]. Tangdu Journal ,2006 22(3): 1-5.
- [15]王溥. 唐会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WANG Pu. Tang Hui Yao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0.
- [16]陈寅恪. 元白诗笺证稿[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CHEN Yinke. Yuan Bai Shi Jian Zheng Gao [M].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 [17]赵丰. 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M]. 陕西: 三秦出版社, 1992.
ZHAO Feng. Silk and Silk Road in Tang Dynasty [M]. Shaanxi: San Qin Press ,1992.
- [18]杜佑. 通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DU You. Tong Dian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8.
- [19]李林甫. 唐六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LI Linfu. Tang Liu Dian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2.
- [20]卫杰. 蚕桑萃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WEI Jie. Quintessence of Sericulture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6.
- [21]岑建功. 旧唐书逸文[M]. 刻本. 1842(清道光二十二年).
CENG Jianguo. Unofficial Pieces of Jiu Tang Shu [M]. Block-printed Edition. 1842(Qing Dao Guang 22 Years) .
- [22]李昉. 太平御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LI Fang. Tai Ping Yu Lan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0.
- [23]宋敏求. 唐大诏令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SONG Minqiu. Tang Da Zhao Ling Ji [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59.
- [24]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OU Yangxiu, SONG Qi. Xin Tang Shu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5.
- [25]彭定求. 全唐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PENG Dingqiu. Quan Tang Shi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0.
- [26]长孙无忌. 唐律疏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ZHANGSUN Wuji. The Criminal Law of Tang Dynasty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